

中共长沙早期组织创建的几个问题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蚌埠 233030)

[摘要] 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存在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从历史文献和当事人回忆材料中均能得到印证。长沙是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确定的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毛泽东则是陈独秀发展长沙组织的主要联络对象。上海发起组创建之际,毛泽东正身处上海,且与陈独秀有过多次晤谈,这应是上海发起组创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参与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并负有回长沙发展党组织的任务,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当在1920年6月间。毛泽东返湘后即从创办文化书社、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方面入手,积极投身到创建长沙早期组织的工作中,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当在1920年8月前后。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长沙早期组织; 上海发起组; 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1-0074-07

在1921中共正式成立前,长沙早期组织作为国内6个早期组织之一,这在党史界已形成了基本共识。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长沙早期组织不断有人撰文提出质疑^①,又因之衍生出对毛泽东1920年入党时间的质疑^[1]。因此,本文拟就长沙早期组织创建的几个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 有关长沙早期组织的文献记载

质疑长沙早期组织存在论者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认为至今未发现任何有关长沙在“一大”前建党的史料^[2]。实际上并非是因为文献资料的完全缺乏,而恰恰是论者对有限的文献资料视而不见。

最能反映中共早期组织创建情况且最具史料价值的文献资料,当属形成于1921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文献提供了长沙早期组织最重要的信息。该文献记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年中由陈独秀等5人在上海成立,至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该组织已发展成为拥有6个小组和53名党员的组织。出席“一大”的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济南、汉口、广州、长沙和日本等7个地方^[3]。质疑长沙早期组织存在的论者认为,代表来自7个地方,但只有6个小组,必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小组。没有小组的地方正是长沙^[4]。这种解读显然曲解了历史文献的本意。代表来自7个地方,但小组只有6个,必有一个地方没有小组,这是

无需置疑的。笔者认为,没有小组的地方是上海,而不是其它别的地方。上海的党组织,今天人们称之为上海发起组,并不是历史上的名称,当时的名称就是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所提到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实际上指的就是今天人们称之为上海发起组。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先后在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建立了6个小组。上海党组织是党的总部,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党组织是党的分部或小组。今天人们知道,北京、武汉的党组织均称为“共产党支部”。“支部”从何而来?当然是从创立于上海的中国共产总支部而来。正因为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所以当上海发起组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才会向上述各地的党组织发出开会通知并寄去路费,各地代表克服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前往上海赴会。对这次会议的发起、组织及与会人员的食宿安排,上海发起组作了认真准备和精心谋划。新近公布的档案资料表明,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最迟在1921年4月份已开始启动^[5],北京小组还专门派张国焘提前到上海,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很难设想,对这样一次意义重大、十分严肃的会议,上海发起组的李达、李汉俊等人会错发与会通知,使没有党组织的长沙、甚至还不是党员的毛

[收稿日期] 2016-10-22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计划立项建设项目弘扬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项目“党史研究工作室”资助(编号:Szzgjh1-1-2017-7)

[作者简介] 黄爱军(1960-),男,安徽宿松人,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泽东、何叔衡与会。

除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外,长沙早期组织的当事人、经历者,也留下了不少重要的珍贵史料。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提到,最早在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共有6人,其中包括党的著名领导人萧铮^{[6]565}。1939年5月12日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曾告诉萧三,他1920年7月从上海返回长沙后所开展的活动,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就是成立了共产党长沙分部^②。比照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代表登记表中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二者恰好得到了互相的印证。此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6月21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讲话中,一再提到创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当指长沙早期组织。

除了毛泽东留下的回忆材料外,其他当事人也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中共早期党员彭述之后来曾回忆,他1920年9月抵长沙时,由于在长沙逗留的时间短,未能亲自了解长沙早期组织的详情,但他却十分肯定地说:“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并列出了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李浑、易礼容等5位成员的名字^{[6]599}。青年毛泽东好友、新民学会核心成员萧子升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中回忆,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毛泽东等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在学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并希望他也能参加^{[6]575}。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亦回忆道,1920年7月毛泽东返回长沙后,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身份,在湖南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7]。此外,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李达、张国焘、周佛海等人的回忆材料,均提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二 长沙是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作为重点发展的区域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向全国各主要中心城市发展组织。在上海最初参与创建共产党的只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5人。不久施存统和陈公培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和法国留学,并各自带了一份党纲,负有到日本和法国发展党组织的任务。留在上海的发起组成员仅剩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3人,不得不担负起组织发展、工会、青年团、外国语学社等多面工作。据俞秀松自传记载,作为临时书记的陈独秀,主要负责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他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8]231}俞秀松自传中没有列出4个城市的具

体名称。学者金立人依据一大代表分布于上海、北京、广州、济南、武汉、长沙6个城市的情况,认为陈独秀负责的4个城市是北京、广州、济南和长沙,负责武汉建党任务的则是李汉俊。“由于李汉俊离党,俞秀松在写自传时有意将其负责的城市漏去。武汉是李汉俊负责的地区。”^[9]学者信洪林的看法则有所不同,“现在已知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四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得到过陈独秀的指导。”^[10]但二人均将长沙列为陈独秀负责的4个城市之一。作为当事人的周佛海在20世纪40年代留下的《扶桑笈影溯当年》回忆材料中,列出的是北京、武汉、长沙、广州4个城市^{[11]27,30}。

通过上述分析,再结合李达、包惠僧、张国焘等人的回忆材料,长沙作为上海发起组发展组织的重点区域之一,应该是确切的。既然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初即将长沙列入组织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很难设想,在中共正式成立前,当各地共产主义者群起响应上海发起组函约,积极投身于创建中共早期组织的大潮中时,毛泽东等长沙的共产主义者却悄无声息,对长沙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迟迟不曾着手进行,这显然与毛泽东重视实践、擅长实践的个性相背离。

三 毛泽东具备陈独秀作为联络发起人的条件

1920年6月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主要工业城市,开展党组织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在长沙由毛泽东负责^{[12]8}。

既然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初即将长沙列入组织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那么陈独秀什么时候才开始与毛泽东进行建党方面的联系呢?流行的观点认为,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陈独秀于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专门给毛泽东写信,委托他在长沙建党^③。这一说法,最早可能出自1949年李达《自传》中的说法^{[13]2}。李达几十年以后的追忆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仅就李达参与上海建党的具体情形而论,采用李达的说法当值得斟酌,因为李达并未参与上海发起组创建的整个过程。当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5人发起建党的时候,李达尚滞留在日本。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供的日本警方对李达行踪的监视记录显示:李达1920年8月17日从日本回国,游杭州后于9月6日方抵上海^[14]。

1920年5月初至7月初,正当上海发起组酝酿发起创建之际,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正身处上海。既然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初即将长沙列入重点

发展组织的地区之一,毛泽东在上海期间且多次与陈独秀接触,陈独秀何以不直接吸收毛泽东入党,再委托毛泽东返湘后组党?毛泽东返湘后,陈独秀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建党。这一流行说法,似不太符合常理。这一流行说法之所以被广泛认同,除了有李达的回忆材料作支撑外,还与较流行的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8月的说法有关^④。资料显示,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应该是1920年6月,而不是此后的8月。6月说不仅有当事人施存统、俞秀松留下的回忆材料作支撑,更有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俞秀松日记的有力印证。8月说仅有李达、张国焘、张申府、包惠僧等间接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作支撑。

我们这里还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就是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的时候,毛泽东是否具备作为发展对象并委托返湘后发展党组织的条件?流行的陈独秀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建党的说法,至少说明毛泽东返湘后是完全具备条件的。考虑到毛泽东正处于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特殊背景,我们仍需做两点具体分析:

第一,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来分析,毛泽东具备陈独秀作为发展党员对象的条件。是否具备作为发展党员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同,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同。这也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分子的重要标准。资料显示,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活动期间,已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很确切地告诉斯诺,他在1920年初第2次到北京期间,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得到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正是通过北京期间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阅读,从而确立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自信地认为,到了1920年夏天,他在理论和某种程度上的行动上,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6]571}。1941年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又作了与斯诺谈话中类似的回忆^[15]。

关于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不少学者认为是1920年底1921年初,并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⑤。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自己却认为是1920年夏天呢?1920年夏天,正是毛泽东经上海返回长沙的时间,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毛泽东认定自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呢?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在上海期间,与正在发起建党的陈独秀建立了思想上和

组织上的联系,并负有回湖南建党的使命。

第二,从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来分析,他们无疑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陈独秀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对象,除了同事、同乡、学生等熟人圈子外,主要就是新文化同人。“志趣或思想的投合”是连接新文化同人的精神纽带。1920年夏,旅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达,抱着拯救中国的愿望归国。虽然在此之前李达与陈独秀未曾谋面,却因共同的理想信仰而互相引为同志。李达回上海后,首先拜访陈独秀,适逢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活动,便邀请李达参加,做了发起人^{[13]2}。同样是1920年夏,旅日学生周佛海返沪,因在张东荪主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陈独秀的关注。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周佛海遂参加了上海发起组及其创建活动^{[11]31-32}。

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程度,当在李达、周佛海之上。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就成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一个热心的读者。毛泽东特别喜欢陈独秀的文章,并将陈独秀视之自己人生的楷模^{[6]566}。毛泽东还不只是《新青年》的一个热心的读者,他还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投寄《新青年》,此文得到主编陈独秀的首肯,并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发表。毛泽东因之跻身新青年同人作者群体,并与陈独秀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后来毛泽东赴北京并受聘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工作期间,与陈独秀自然有更多的近距离接触。

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下,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进步社团新民学会。该团体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毛泽东也因之脱颖而出,逐渐成了湖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著名人物,这不能不引起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的瞩目。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期间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毛泽东积极投身于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并在《湘江评论》发表营救陈独秀的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称为“小兄弟”、“好兄弟”。毛泽东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每周评论》称该文“眼光很远大,……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6]。陈独秀出狱后,对毛泽东等在湖南的活动高度肯定,专门撰写《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予以称赞。陈独秀南下上海后,即与毛泽东等26人署名,发起筹备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1920年5月初毛泽东由京抵沪,在上海逗留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与陈独秀有过多次接触,并就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学习、个人信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话,对正处于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毛泽东来说,产生了“深刻的印象”^{[6]571-572}。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后,仍与陈独秀保持着密切联系。8月创办文化书社,聘请陈独秀为书社的“信用介绍”。同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该会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等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陈独秀也及时将团章、《共产党》月刊寄给毛泽东,指导湖南的建党、建团工作。由此,笔者推断,毛泽东逗留上海期间,陈独秀吸收毛泽东入党并委托其返湘后发展党组织,是十分自然的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蔡和森向毛泽东写信提出建党问题时,毛泽东在回信中则明确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并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7]。在党处于秘密状态下,如果说毛泽东与陈独秀没有十分特殊的关系,是建党伟业的局外人,这岂不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吧!

四 毛泽东参与了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

据施存统、俞秀松、李达、周佛海等人的回忆,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是通过一系列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的。在为建党举行的一系列座谈会的活动中,陈独秀、维经斯基无疑是整个活动的主角。资料显示,毛泽东参加了系列座谈会中的部分座谈活动。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所提及的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书籍及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话,决不是无缘无故、无目的的闲谈,极有可能是建党系列座谈活动中某次或某几次座谈的内容。在毛泽东参加的建党系列座谈活动中,除陈独秀外,还应有维经斯基、彭璜等人。对于与维经斯基座谈的情况,虽然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未曾提及,但彭璜在1920年8月所发表的《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中,则披露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彭璜在感言中说:“我记得前次上海会见一位吴先生,他是很提倡国际主义的。”^{[6]516}学者任武雄通过考证后认为,彭璜这里所提到的吴先生,就是指维经斯基,因为维经斯基的中文名为吴廷康^[18]。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参与了上海发起组创建活动,这在萧三撰写的《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一文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萧三写道:“一九二〇年四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除做驱张的工作

及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还同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开会,讨论会务,并同大家合影。同时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进行了联系。”^{[19]384}萧三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实际上就是上海发起组的前身。由此可见,有些中国近现代史教材关于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的记载,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⑥。

五 毛泽东的入党时间

既然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参与了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并负有回长沙发展党组织的任务,那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当在1920年6月间。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八大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代表登记表,其中有关入党时间一栏中,毛泽东填写的时间是1920年。作为当事人的毛泽东所填写的入党时间,在无法找到相关文献资料佐证的情况,与其他非当事人的说法就当具有最大的权威性。但有论者却以毛泽东的说法是孤证为由,对毛泽东1920年入党这一事实提出质疑,并以非当事人李达、易礼容的说法来印证^[1]。实际上,李达、易礼容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1957年李达在《回忆党的早期活动》中,说“长沙那时可能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说法^[20];1962年“七一”前,李达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讲“一大”报到时毛泽东是团员的说法^{[21]465},均与此前他自己多次回忆中的说法相矛盾。1949年李达在自传中、1955年在回忆“一大”的文章中,均说当时有7个小组,包括长沙小组在内,并给各小组寄出了有关召开党的一大的信函。很难设想,在长沙无党组织、毛泽东尚不是党员的情况下,负责组织、联络召开一大的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怎么会把会议通知寄给毛泽东?^[21]至于1979年易礼容回忆中的说法^{[12]280-284},显然是把中共湖南支部建立的时间与长沙早期组织建立的情况给混淆了。如果长沙党组织果真迟至1921年10月才产生,且最初仅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三人,那么,在1921年11月由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要求长沙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四区一样,“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22]。将长沙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各地作同样要求,岂不太令人匪夷所思?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他入党时没有介绍人,是“自己搞的”^[23]。对毛泽东这一说法,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长沙早期组织初始创建时的情形。毛泽东所说的“是自己搞的”说法,无疑反映了

中共创始之初的实情。纵观各地早期组织创建的实际情况,完全属于“是自己搞的”早期组织,严格讲起来就是上海发起组。其他各地的早期组织,都不完全“是自己搞的”,都是上海发起组直接指导和推动的结果。上海发起组指导和帮助各地建党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赴上海参与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然后返回各地发展党的组织。如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入党后赴日本和法国,刘伯垂由广州经上海去武汉,毛泽东由北京经上海返湘,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由北京经上海返广州,张国焘、张申府先后由北京抵上海作短暂逗留后再返北京等。这种现象决非是偶然或巧合,均与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及指导和推动各地的建党活动有关。因此,毛泽东所说的“是自己搞的”说法,完全符合其参与上海发起组创建时的情形,这也为毛泽东1920年6月入党的立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

六 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

关于长沙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由于缺少文献资料的记载,目前有“9月”、“10月”、“11月”、“1920年初冬”、“1921年初”等说法。其中最流行的是“11月”说。主要依据是张国焘、包惠僧留下的回忆材料^{[6]740}。再就是基于同上海、北京早期组织的比照。由于当时北京、上海集聚了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员,这两地无疑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活动的中心,是建立党组织的重镇,因而有论者即认为,湖南早期组织建立的时间不会早于北京组织建立的1920年10月^[24]。

根据上文有关毛泽东参与了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的分析,结合彭述之提供的回忆材料和毛泽东返湘后实际活动情况来考察,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值得商榷。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当在1920年8月前后,我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上海、北京无疑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两个最主要的中心,且历史上又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但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长沙建党一定就在北京建党之后。毛泽东1920年7月初返湘后,即着手长沙党组织的创建工作,而北京的建党活动是在张国焘、张申府返京后的9月至10月间才开始的。

第二,张国焘、包惠僧均不是长沙早期组织创建的直接当事人,他俩的回忆材料远没有彭述之的回忆材料史料价值高。彭述之1920年9月抵长沙后,虽然未能亲眼目睹长沙早期组织的实际情形,但却从长沙早期组织成员贺民范那里了解到该组织的客观

存在。彭述之的回忆,讲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6]599}。

第三,1920年8月间,长沙文化书社的创办,是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发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人,均是人所共知的长沙早期组织的成员。文化书社不仅是湖南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而且与湖南建党建团工作有最密切的关系^{[19]470},实际上是湖南党组织的一个公开活动机构^{[19]386,470}。文化书社还与上海发起组有密切的互动。文化书社创立时,即请陈独秀作信用担保。书社销售的进步书刊,就包括上海发起组发行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书社是上海发起组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在湖南地区的延伸与拓展。

第四,1920年8月间,长沙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立,是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⑦。据包惠僧回忆,党、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一套人马从事三方面的工作^{[12]441}。建党时期,党处于秘密状态,团处于半公开状况,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成了党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各地建立党、团、研究会的先后有差异,北京、上海是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成立党及青年团,研究会实际上是党的前身。武汉则是先建党,随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青年团^{[12]441}。其它各地的情况应与武汉类似。

第五,1920年8月间,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是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又一重要标志。长沙早期组织成员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贺民范等,均是俄罗斯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俄罗斯研究会的活动内容,除了研究、学习外,就是组织开展留俄勤工俭学活动,并与上海发起组积极互动。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批进步青年,就是经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然后转赴苏俄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各地早期组织中是独一无二的。

第六,1920年9月至10月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是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又一明显标志。根据《刘少奇年谱》^⑧和张文亮日记的有关记载,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时间,应该是在1920年9月至10月间。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刘少奇、彭平之、张文亮等。到中共一大召开前,长沙团员达到39人^{[6]478}。由于建党初期党团关系的特殊性,不仅“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同时就有团的组

织”^[25],而且党团几乎是不分的。如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8]199}团组织的机关刊物,也正是人们所熟知的党组织的机关报——《共产党》月刊^{[8]200}。实际上,党是内部的称呼,团是外部的名称。正如早期党团组织负责人施存统所说:“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12]73}

通过对上述与中共长沙早期组织有关的6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1921年中共正式成立前,长沙不仅存在党的早期组织,而且是各地早期组织中成立较早的组织之一。长沙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前后。

第二,毛泽东不仅是中共正式成立时50几位党员中的一名,而且是上海发起组创始之际最初的几名党员之一。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应为1920年6月间。

第三,长沙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是在上海发起组的指导和推动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进行的,这在中共各地早期组织创建中是一个很大的独特。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均能看到俄共(布)党员活动的身影。这正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中,较少提到长沙早期组织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长沙早期组织未受无政府主义者影响,其他各地早期组织或多或少均不同程度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胡庆云、肖 牲:《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306-311页;曾长秋:《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各地早期组织的考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3-37页;高国发:《关于长沙中共党组织成立在“一大”之后的考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第394-406页;李维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7-21页。

②萧 三:《从新民学会到旅欧支部》,载1982年湘乡党史办编《党史资料》第1辑,转引自唐振南:《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的诞生与陈独秀的关系》,《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第240页。

③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8页;倪兴祥、陆米强编著:《此间曾著星星火——中共创建及中共中央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邵维正主编:《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

④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

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6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9页;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页;邵维正主编:《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⑤参见袁竞雄:《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第7-14页;崔景明:《毛泽东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历史原因》,《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2期,第18-21页;单国新:《略论五四时期毛泽东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中州大学学报》(综合版),1993年第4期,第14-20页。

⑥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2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先材主编:《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0页。

⑦新民学会会员萧三、张国基均回忆,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参见《新民学会资料》,第386-387页;《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18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8页载:1920年10月,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

[参考文献]

- [1] 向继东.毛泽东入党年月考[J].炎黄春秋,2009(10):19-21.
- [2] 曾长秋.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各地早期组织的考证[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33-37.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1)[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
- [4] 胡庆云,肖 牲.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J].近代史研究,1984(2):306-311.
-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59.
- [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7] 张侯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1)[M].北京:三联书店,1979:102.
- [8]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秀松纪念文集[G].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 [9] 金立人.创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的误导与陈独秀的正确[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9):10-13.
- [10]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的创建与发展在上海[G].上海:上海图书出版社,2011:73.

- [11] 周佛海. 往矣集[M]. 上海: 古今出版社, 1943.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2)[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13] 李达. 李达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14] [日]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28.
- [1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78-379.
- [16] 胡适. 介绍新出版物[J]. 每周评论, 1919(36).
- [1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
- [18] 任武雄. 1920年俄共代表魏金斯基会见过新民学会的彭璜[M]//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 第8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92.
- [19] 中国革命博物馆. 新民学会资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20] 李达. 回忆党的早期活动[J].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 1980(1): 1-5.
- [21] 王炯华. 李达评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2]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26.
- [23]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291.
- [24] 宫玉书, 曹平. 毛泽东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J]. 学习与探索, 1983(6): 132-135.
- [25] 张闻天.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142-143.

Some Issues Relat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Group of Changsha

HUANG Ai-jun

(Anhui Fin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early organization in Changsha should be an indisputable fact, which can be confirmed by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memoirs of the participants. Changsha was designated to be one of the key areas to develop after the Shanghai group being launched. Mao Zedong is the main contact in Changsha. During the time when PRC was initiated in Shanghai, Mao Zedong had had many meetings with Chen Duxiu in Shanghai. Thi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hanghai-initiated group's creation. Mao Zedong took part in the creation of the Shanghai-based group and had the task of organizing the party in Changsha, Mao joined the party time in June, 1920. Mao established a reading club and a Marxist research club when he returned to Changsha, Changsha early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20.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group of Changsha;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group of Shanghai; MAO Zedong